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941

文化外交视域下美国和平队在秘鲁教育活动中的角色研究（1961-1968）

安子涵¹

(1.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 和平队是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文化外交政策的典型代表。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时期, 秘鲁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和平队特遣队之一, 并且进入发展的全盛时代。但受冷战以及秘鲁民族主义运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和平队志愿者在秘鲁开展教育服务的历程十分曲折,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外交博弈的牺牲品。因此, 美国和平队在秘鲁教育活动的开展, 是美国外交政策与秘鲁国家需求之间关系的重要缩影, 也可窥见其背后隐藏的既具有一定牺牲色彩, 又能够超脱双方利益, 破生出新志愿意义的角色担当。

关键词: 文化外交; 美国; 秘鲁; 和平队; 角色研究

二战结束以来, 拉美地区长期扮演着美国稳固势力的后方角色,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至 20 世纪 50 年代, 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与崛起已成燎原之势, 美国亟需对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开始对其僵硬的冷战战略与外交政策做出调整, 使外交能够为冷战的推行提供正面服务。20 世纪 60 年代, 伴随约翰·肯尼迪 (John Kennedy) 上台执政, 文化外交^①受到美国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平队^②便是美国政府战后发起的一次大规模文化外交活动, 以改变美国外交队伍的人员结构, 将能够体现美国优良特性的人纳入其中, 重新树立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良好形象为目标。1961 年 3 月 1 日, 肯尼迪正式启动和平队, 将该组织视为对抗“丑陋的美国人”和“美帝国主义”刻板印象的一种手段, 由萨金特·施莱弗 (Sargent Shriver) 担任和平队的首任长官。肯尼迪十分看重和平队的作用, 他表示: “在我看来, 和平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来强调美国特性中十分重要和真诚的部分, 这些特性引导了我们的很多国际政策。”^[1]1963-1968 年执政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Lyndon Baines Johnson) 同样对和平队的战略价值给予了高度重视。正是在这一时期, 和平队无论在财政预算方面亦或志愿者数量方面, 都达到发展的顶峰。作为冷战高潮时期美国文化外交的产物, 它体现了 60 年代以肯尼迪、约翰逊为代表的“冷战一代”总统的勃勃雄心, 即以美国的自由体制征服世界。

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 美国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已取得较为深入的成果, 主要可分为三个研究阶段。第一阶段为和平队研究的起步阶段, 即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 多为关于和平队的整体性研究, 侧重对和平队这一机构及其职能的介绍, 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就和平队产生的背景、开展的活动等进行查

基金项目: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红色文化研究专项基金项目“文化外交视域下美国和平队在秘鲁教育活动中的角色研究(1961-1968)”(2024214)

作者简介: 安子涵(2000—), 女,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① 文化外交的主要手段包括咨询交流和人员交流。文化外交的核心内容是增强本国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 即争取人心; 而传播文化即价值观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 也是文化外交的目的之一。参见王晓德. 美国文化与外交[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② 和平队: 美国政府创建的从事国际性志愿工作的机构, 主要派遣已经完成了正规大学教育、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美国青年为主力的志愿人员, 到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和城市, 直接与发展中国家的中下层人民打交道, 从事教学、农业和社区开发、医疗保健等工作, 向当地老百姓进行面对面、手把手的技术援助服务, 帮助他们提高教育水平、促进农业、医疗保健及社区的发展, 提高草根阶层的生活条件。参加刘国柱. 和平队与美国文化外交[J]. 学海 2009, 3: 159-164.

考,其中许多作者为和平队亲历者,以和平队官员或者志愿者的视角进行介绍;^①另一类则为采访手记^②。但此时真正的历史性研究较少。至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美国学术界关于和平队的研究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美国学者不仅将和平队视为一个政治问题,还将其作为历史问题展开研究,具体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政治家或者和平队参与者撰写的回忆录^③,二是历史学家对其进行的历史阐释^④,其中后者撰写的著作与论文,相较于前者更具有推陈出新的价值。而在其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后期,伴随肯尼迪政府档案材料的逐渐解密,美国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学术著作^⑤与撰写的论文^⑥均呈现出多维度、全方位发展的良好态势。我国对和平队研究的起步较晚,大多散见于研究战后美国外交史的著作中,仅有少量研究和和平队的专门性著作。^⑦尽管国内外学界已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但较为遗憾的是,拉丁美洲作为美国派遣和平队志愿者的主要地区,学界对该地区的和平队研究并不深入,大多只是作为美国援助拉美政策的一环有所提及,而对拥有世界上最大和平队特遣队之一的秘鲁,学者们更是鲜有关注。因此,基于一定数量的外文档案,以和平队在秘鲁教育活动的发展历程为线索,对和平队与美国外交政策以及秘鲁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予以分析,可以较为深刻地窥见其隐藏的具有一定牺牲色彩的角色担当,为深化学界对美国和平队在秘鲁活动的研究提供基础。

一、理想与困境的交织:和平队在秘鲁的曲折诞生

拉丁美洲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战结束以来,这一地区成为美国全球争霸的战略后方,只有“后院”稳固,美国在“前院”履行“警察”职责时才能无后顾之忧。因此,美国在战后从未松懈对拉美地区的文化渗透。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成为美国和平队力图派出志愿者的主要地区,秘鲁作为拉美地区的重要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和平队特遣队之一,美国派遣至秘鲁的和平队在诸多领域,特别是在处理教育同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方面,成为整个拉美地区的典型,对于和平队在秘鲁教育活动中的角色研究,是探寻和平队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关系的一个代表性案例。

美国派遣至秘鲁的和平队于1962年在国家主任弗兰克·曼凯维奇(Frank Mankiewicz)和拉丁美洲主任杰克·胡德·沃恩(Jack Hood Vaughn)的指导下建立,至1964年,曼凯维奇成为该区域主任,沃恩则于1965年和1966年分别出任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与和平队队长,二人共同负责和平队在拉美地区的大规模社区发展项目。不同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和平队保持的怀疑与观望态度,秘鲁对于和平队是十分欢迎的。1961年11月18日,第一任和平队主任萨金特·施莱弗结束了其在拉丁美洲的宣传和平队之旅,次日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秘鲁的政府甚至反对派报纸都在呼吁和平队志愿者。曼努埃尔·普拉多·乌加特切(Manuel Prado Ugarteche)总统和他的内阁要求志愿者帮助秘鲁发展内陆高地的农村和沿海城市的贫民窟,并指出‘我们的计划正能满足这一要求’。”^[2]至1962年1月25日,美国驻秘鲁大使洛布(Loeb)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 Albertson, Maurice L. *New Frontiers For American Youth: Perspective on the Peace corps*[M]. Public Affairs Press, 1961; Sargent Shriver. *Point of the Lance*[M].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64; Textor, Robert B. *Cultural Frontiers of the Peace Corps*[M]. MIT Press, 1966; Cowan, Paul. *The Making of an Un-American*[M]. The Viking Press and Delta Books, 1970; Ashabranner, Brent. *A Moment in History: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eace Corps*[M]. Doubleday Company, 1971; Cowan, Rachel. *Groeing up Yanqui*[M]. The Viking Press, 1975.

^② 相关研究可参见: Velma, Adams. *The Peace Corps in Action*[M]. Foll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③ 相关研究可参见: Lucas, Payne and Lowther, Kevin. *Keeping Kennedy's Promise, The Peace Corps: Unmet Hope of the New Frontier*[M]. Westview Press, 1978; Wofford, Harris. *Kennedy and Kings: Making Sense of the Sixties*[M].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0; Redmon, Coates. *Come as You Are: The Peace Corps Story*[M].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④ 相关研究可参见: Reeves, Zane. *The Politics of the Peace Corps and Vista*[M].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8; Rice, Gerard T. *Twenty Years of the Peace Corps*[M].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1; Rice, Gerald T. *The Bold Experiment: JFK's Peace Corps*[M].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5.

^⑤ 相关研究可参见: Schwarz, Karen.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An Oral History of the Peace Corps*[M].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91; Searles, David. *The Peace Corps Experience, Challenge and Change 1969-1976*[M].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7; Hoffman, Elizabeth Cobbs. *All You Need is Love: The Peace Corps and the Spirit of 1960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Fritz Fischer. *Making Them Like Us: Peace Corps Volunteers in the 1960s*[M].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8; Michael E.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M].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Thomas J. Nisley. *The Peace Corps and Latin America: In the Last Mile of U.S. Foreign Policy*[M]. Lexington Books, 2018; Fernando Purcell. *The Peace Corps in South America: Volunteers and the Global War on Poverty in the 1960s*[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9; P. David Searles. *The Peace Corps Experience: Challenge and Change, 1969-1976*[M].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21.

^⑥ 相关研究可参见: Jonathan Zimmerman. *Beyond Double Consciousness: Black Peace Corps Volunteers in Africa, 1961-1971*[J].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95, 20(1):999-1028; Elizabeth A. Cobbs. *Decolonization, the Cold War, 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ace Corps*[J]. *Diplomatic History*, 1996, 20(1):79-105; James F. Siekmeier. *A Sacrificial Llama? The Expulsion of the Peace Corps from Bolivia in 1971*[J].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2000, 69(1):65-87; Nathaniel S. Watts, Monica Pajuelo, Taryn Clark, Maria-Cristina I. Loader, Manuela R. Verastegui, Charles Sterling, Jon S. Friedland, Hector H. Garcia, Robert H. Gilman, et al. *Taenia solium Infection in Peru: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Peace Corps Volunteers and Researchers in a Community Based Study*[J]. *Plos One*, 2014, 1-13; Michael E Flynn, Carla Martinez Machain, Alistandra T Stoyan. *Building Trust: The Effect of US Troop Deployments on Public Opinion in Peru*[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9, 63(3):742-755.

^⑦ 相关研究可参见: (美)莱德勒·伯迪克著,朱安,武国译. *丑陋的美国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杨生茂主编. *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资中筠. *战后美国外交史: 从杜鲁门到里根*[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王晓德. *美国文化与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刘国柱. *美国文化的新边疆——冷战时期的和平队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和秘鲁代理外交部长里卡多·埃利亚斯·阿帕里西奥 (Cardo Elias Aparicio) 正式签署了一项美国和秘鲁之间的双边协议, 为和平队在秘鲁的行动奠定了法律基础。该协议规定: “美国政府将根据秘鲁政府的要求提供和平队志愿者, 但须经美国批准。志愿者将在两国政府指定的秘鲁组织的‘直接监督’下工作。此外, 美国还将承担向秘鲁派遣志愿者的所有费用。”^[3]尽管如此, 秘鲁和平队项目的开展并不顺利。1962年秘鲁爆发了军事政变, 致使美国面临着棘手的外交问题与特殊的机遇, 向秘鲁派遣和平队的项目遭遇推迟。

1962年7月18日, 秘鲁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原有政府, 这加剧了美国外交形势的严峻性, 也使肯尼迪在拉丁美洲公开支持民主的决心遭受考验。实际上, 美国对这场政变早有预见。在此之前, 美国大使小詹姆斯·勒布 (James Loeb, Jr.) 在华盛顿就秘鲁可能发生的军事政变进行了最高级别的磋商后曾访问和平队, 与时任和平队总主任萨金特·施莱弗进行了交谈。勒布曾明确表示, 如果发生政变, 美国将暂停对秘鲁的援助计划, 拒绝承认新政府。^{[4](P9)}同时, 勒布还询问了施莱弗和平队将准备如何应对这场可能发生的政变, 施莱弗则表示这将由秘鲁和平队计划的负责人曼凯维奇决定。为此, 曼凯维奇还曾向他的采访者吹嘘, 他不知道政府中还有其他地方的战地指挥官享有这样的权力。然而, 在政变发生后, 曼凯维奇发现自身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不具有任何权威性。政变发生后的第二天, 和平队总部曾召开工作人员会议, 曼凯维奇当时明确表态: “尽管发生了政变, 秘鲁项目仍将按计划启动。”^[5]但由于肯尼迪总统拒绝承认新政权, 并下令暂停对秘鲁的双边援助, 他的声明并没得到任何采纳。在施莱弗就秘鲁局势向和平队拉美地区主任杰克·胡德·沃恩征求 (Jack Hood Vaughan) 意见时, 沃恩表示, 国会对于军政府的强硬态度可能会迫使和平队推迟秘鲁项目的启动。而另一位与会者则直接提到, 和平队的秘鲁培训项目已经被暂停。^[6]直至美国政府考虑到与秘鲁前一届普罗多政府签署了授权和平队在秘鲁活动的协议, 加之普罗多总统是第一位在华盛顿拜访肯尼迪的拉美领导人, 且他在会见中强调了自身对引入外国资本至秘鲁的兴趣, 以及他对打击“外国和破坏性意识形态渗透”的关注。肯尼迪为尽快在秘鲁赢得民心, 防止共产主义在当地的扩张, 最终转变了态度, 秘鲁和平队计划在推迟一月之后得以重新启动。

由于秘鲁计划是美国在拉美最大的和平队项目之一, 美国十分重视这支和平队的人员选择。在某种程度上, 其人员规模寄托了美国的一个重要目标, 即重塑美国在拉美的国家形象。但志愿者的实际组成与预期存在较大落差。施莱弗曾要求对志愿者进行系统筛选, 选择具备必要技能的人。但事实上, 大多数志愿者都是和平队所称的“普通学士”, 他们通常没有工作经验, 也没有明确的工作技能。尽管和平队多次进行专门的招募活动, 但始终未能纳入大量技术工人或具有高等学位的人员。加之和平队急于扩张, 希望以一种低廉的运营成本给立法者留下深刻印象, 也疏于对志愿者进行职业技能与语言培训。实际在美国国内, 曾有官员提议延长和平队的培训计划, 但遭到了施莱弗的拒绝。他认为延长培训会大大缩短志愿者两年的海外服务时长, 这最终导致秘鲁和平队的培训情况比以往还要糟糕。最终, 由68名缺乏培训却被美国寄予厚望的和平队志愿者, 于1962年9月8日抵达秘鲁, 开启了美国和平队在秘鲁开展活动的时代。

实际上, 彼时美国一直宣称秘鲁和平队的非政治形象, 但我们从其组建过程中, 不难窥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 其行动听从于国会决议, 并不具备自主权, 始终为美国的外交目标服务, 这在本质上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强硬的外交手段无异。若用历史学家、肯尼迪时期的前白宫助理阿瑟·M·施莱辛格 (Arthur M. Schlesinger) 的话来讲: “和平队是新边疆试图超越冷战时期‘艾奇逊-杜勒斯理论’的最亲切表达。”^{[7](P473-476)}

二、被动大于主动: 和平队在教育活动中的角色担当

教学工作是和平队在第三世界国家规模最大且持续时间最长的项目, 同时也被受援国认为是该组织理所当然实施的项目, 它使和平队的规模可以按照决策者的要求迅速扩大。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受援国的需要。在20世纪60年代, 许多刚刚独立的民族国家都缺乏从事初等与中等教育的老师, 且国家政府也难以为本国的基础教育投入更多的财力和精力, 分配至教育领域的和平队志愿者就被这些新兴国家寄予众望, 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填补国家教育真空的重要力量。二是从事教学的门槛与成本较低。由上述可知, 前往秘鲁的和平队志愿者并未具备合格的专业素养, 且和平队也不相信自身有能力培训他们的其他技能。因此, 尽管和平队担心这会引发公众和国会的不良反应, 但为节约成本, 教育仍然成为和平队最大的活动领域。据统计, 1961-1963年间, 在北非、近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队志愿者中, 有61%被分配到教育项目中, 而在非洲, 这一比例更是高达80%。直至1966年, 虽然伴随和平队其他项目的增多, 从事教学工作的志愿者比例有所下降, 但也维持在50%以上。不过拉丁美洲却不同于其他地区, 最初只有22%的志愿者被分配到教育项目,^[8]而在秘鲁这一占比则更低, 对和平队在该国的教育活动研究也更具特殊性, 笔者旨在通过和平队在秘鲁大学与中学的教学活动分析其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担当。

(一) 和平队在秘鲁大学教育中的角色

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教育志愿者被分配到中学。前和平队工作人员凯文·洛瑟(Kevin Lowther)和C·佩恩·卢卡斯(C. Payne Lucas)也曾提出,应把重点放在中学而不是小学,因为志愿者在那里的教育影响可能更大。^[9]但是拉美地区志愿人员的分布情况与世界其他地区并不相同,尤其是在秘鲁,和平队志愿者在从事教学工作的最初四年,大多被分配至大学教学项目中。施莱弗在向国会解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时,提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教育一个可能只会说印第安方言的孩子时,涉及到更严格的语言要求。^{[10](P134)}此后不久,曼凯维奇解释说:“秘鲁‘嫉妒’他们的小学和中学教育制度,不想承认自身在这些级别需要帮助。这就是秘鲁和平队把重点放在大学的原因。”^{[11](P134)}但二人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实际上,和平队之所以重视在大学的大学项目,根源并不在于语言技能的不足与拉丁人的妒忌,而是受以施莱弗为主的和平队领导者希望宣传冷战观念的影响。根据和平队工作人员的说法,施莱弗曾被一个想法所吸引,即通过和平队的大学项目,使拉美大学生成为抵制卡斯特罗革命号召力的一个重要群体。并且在1962年5月,他曾在和平队高级工作人员与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乔治·C·麦吉(George C. McGhee)参与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和平队的大学项目很好地服务于国会利益。”^[12]此外,在1963年初,时任和平队拉丁美洲地区主任杰克·沃恩(Jack Warn)与进步联盟协调员特奥多罗·莫斯科索(Teodoro Moscoso)的谈话也体现出其希望对秘鲁大学生灌输亲美思维的意图。沃恩表示,大学教育项目与莫斯科索希望和平方队计划更加重视拉丁美洲青年思想的愿望相一致。^[13]并且当施莱弗和莫斯科索在国会露面时,也经常提到大学教学项目对反共产主义斗争的重要性。莫斯科索更是毫不避讳地指出:“秘鲁的大学是‘共产主义活动的中心’。”^{[14](P135)}施莱弗则以“共产主义的温床”和“马克思主义的粪坑”此类更具色彩性的形容附和了莫斯科索。但后来他又否定了这种言论,称和平队的教学项目并无反共亲美的意图,而是致力于改善秘鲁落后地区的教育情况,并表示志愿者们甚至驻扎在1958年曾发生过学生向副总统尼克松投掷石块事件的大学里。

但是这种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宣传却很难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找到例证。据统计,在1963年底,拉美地区共有156名志愿老师,其中有44人被分配至秘鲁,但是施莱弗指出这其中很少有人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语言与学术资格。^[15]赫伯特·韦格纳(Herbert Wegner)在对秘鲁和平队的教学活动进行评估后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但他与施莱弗在行动建议上产生了分歧。他指出必须要克服人力资源问题,即便志愿者的海外服务时间不得不缩短,也应延长培训计划,培养出具备必要科目和语言能力的志愿者。同时他严肃表示:“除非我们有所行动,否则现在的大学一代对政治权力的支配将意味着另一个古巴。”^{[16](P7)}但培训计划并没有按照韦格纳的建议进行修改。相反,和平队向秘鲁大学输送的不合格志愿者越来越多。而在这一过程中,大多数志愿者都并不清楚其教学活动的目的,致使和平队一度陷入被秘鲁当局驱逐的尴尬境地。实际从和平队到达秘鲁之日起,就曾发生过多起抗议和平队的示威和游行,参与者多为秘鲁的大学生。1963年9月,更是发生了和平队志愿者被驱逐出大学校园的事件。当时,利马大学(University of Lima)负责新生的老师邀请和平队志愿者为新入学的大学生做三场与美拉关系相关的主题演讲。这极大引起了当地大学生的不满,他们认为志愿者在利用秘鲁的大学教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辩护,并向校方提出了抗议。几天后,一部分秘鲁大学教师也向校方递交抗议声明,认为和平队将“政治宣传”带入了秘鲁大学的教室里。在大部分师生的巨大压力下,利马大学委员会最终于11月初宣布,将所有在该校任教的和平队志愿者逐出校园。

尽管如此,也有一些志愿者受到了秘鲁大学生的欢迎。应秘鲁瓦曼加大学(University of Huamanga)罗梅罗(Romero)校长的要求,三名曾在康奈尔接受培训的志愿者被分配到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中,为80多名学生教授初级和高级英语。和平队精心挑选了志愿者加入到这一教学活动中,他们都精通西班牙语,其中一人还拥有拉丁美洲的研究生学位^[17]。曼凯维奇也对这一教学项目进行了实地考察,并通过美国的慈善基金会,为瓦曼加大学争取到5000美元的捐款。这些志愿者在瓦曼加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而后新上任的瓦曼加大学校长埃弗拉因·莫罗特·贝斯特(Efrain Morote Best)也对这些志愿者表示了个人的喜爱。此外,一位来自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化学工程博士,其教学活动也凸显了和平队志愿者在当地的價值。这位化学博士最初抵达秘鲁时,被和平队的工作人员告知秘鲁没有化学工程学院,并指派他前往普诺大学(University of Puno)教授一些他知之甚少的东西。后来,由于自身的积极主动,这位化学博士在特鲁希略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Trujillo)的化学工程学院找到了一份工作,并赢得了所在大学的好感。他的这种成功,正是由于他满足了秘鲁教育真正的需求,而这正是大部分和平队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尚未学会的东西。^{[18](P40-43)}

但是,由于和平队在这四年间的大学教育中遗留了很多问题,秘鲁和平队的最终报告宣称,和平队真正的教育项目直到1965年才开始,因此,从1961年到1965年间,几十名志愿者在秘鲁的大学里进行的有争议的服务,在历史上就变得默默无闻,但作为和平队在秘鲁教育服务的开端,这一阶段和平队在秘鲁的

角色扮演仍具有重要意义，为美国和平队服务计划的改进提供了参考。

(二) 和平队在秘鲁中学教育中的角色

自 1965-1966 年开始，和平队在秘鲁教学计划的重点发生了从大学向中学的转移，这其中包括师范学校或教师培训学校。虽然当时的大学教学计划并未停止，但伴随教学活动存在的问题与争议变得愈发尖锐，和平队在师范学校继续其教育计划的机会变得更具吸引力。实际在秘鲁，无论和平队的的志愿者在哪里授课，其高级工作人员和项目策划者都一贯以冷战理论为他们的活动辩护。例如，1963 年，美国进步联盟主任特奥多罗·莫斯科索敦促和平队高级工作人员扩大在秘鲁等拉美国家的志愿教学项目。他警告说：“现在共产党开始在学校里出现了，中学不应该被忽视，那里的青年问题甚至比大学里还要严重。”^{[19](P133)}这种政治关切难免对志愿人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延伸到初等教育中。曾有一名和平队志愿者便固执地要求教育部接管位于圣马丁·波拉斯利马区 (Lima barrio San Martin de Porras) 的一所私立幼儿园，以便“把它从学校管理委员会的共产党校长和左翼主席的掌控中解救出来”。

伴随局势的变化以及反共氛围的烘托，自 1964 年起，秘鲁就有部分志愿者在师范学校工作，他们中间的多数人为大学教学项目的流放者。1965 年，评估人员科布 (Cobb) 和克鲁格 (Brugger) 首次提出在师范学校开展和平队项目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拟议的新方案有许多吸引之处。师范学校虽同大学一样，提供了一个“影响未来一代的战略支点”。但其在管理权上不与学生共享，而且本身也不拥有政府赋予大学的自治权。因此他们希望，在政治波动性较小的师范学校里，不太可能发生学生投票将和平队驱逐出秘鲁国家工程大学这样的尴尬事件。^{[20](P43,47)}此外，他们认为，该项目将适合接受过一些西班牙语和教师教育培训的年轻文科毕业生。这一项目的策划者也对以上想法持赞同态度。大约一年后，便有 24 名志愿者在秘鲁第一个正式的师范学校项目中接受了培训，在到达利马后，他们中间有 7 人被分配到秘鲁的中学进行教学，加上已经在中学工作的 7 名志愿者，最终秘鲁和平队的志愿者被分配在 17 所不同的学校开展教学工作。^{[21](P162)}1968 年，和平队秘鲁主任尤金·贝尔德 (Eugene Baird) 向国会声称，迄今为止取得的成果鼓励了和平队继续开展中学教学项目，并且秘鲁政府最高层已经认识到教师培训的必要性。尽管这一时期，由于国际石油公司 (IPC) 争端，美国的公共资金来源有限，但仍资助秘鲁建造了数千间新教室和几所完整的学校。因为贝尔德认为，和平队志愿者可以为新兴的师范学校提供所需的人力，并对秘鲁同事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有迹象表明，一些旧有问题在和平队的这一新项目中再次出现。如人员规划不周、和平队志愿者与秘鲁同事之间关系冷淡等。评估人菲利普斯 (Phillips) 是第一个对该项目进行考察的人，尽管他对教育项目的整体方向转变表示赞同，但还是对中学教学项目感到不安。例如，菲利普斯写道，志愿者与秘鲁工作人员之间的不良关系困扰着该项目的发展。一些志愿者对自己“缺乏影响力”感到沮丧。其中一名志愿者曾向菲利普斯抱怨说，“一个秘鲁人就毁了整件事。”^{[22](P147,157)}而这些工作上的问题与人际关系的失败，也导致许多和平队志愿者纷纷退出该项目。据统计，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一所含有 32 名志愿者的师范学校减员率高达 43.8%。^{[23](P163)}评估人员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和平队的工作人员将目标致力于促进志愿人员与秘鲁教师之间的密切合作，从而传输美国的价值观；二是这一项目并不符合秘鲁教育部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秘鲁当局势必会阻碍和平队中学项目的发展。

因此，在志愿者与秘鲁民众的文化冲突以及以及秘鲁政府的阻碍下，和平队的中学教学项目也逐渐走向衰落。至 1968 年 10 月 3 日，秘鲁军队在胡安·贝拉科·阿尔瓦拉多 (Juan Bellarco Alvarado) 将军领导的一场不流血政变中，迫使贝朗德总统流亡，而后他们建立了一个极端民族主义政权，新政权认为美国对秘鲁教育的参与，刺痛了本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此，和平队能够安排的志愿教师锐减，并且还要经过军政府的批准。最终和平队在秘鲁教育项目，被一种极强的民族主义怨恨情绪笼罩，于 1968 年结束了它的全盛时代。

从上述和平队在大学与中学进行的教学中，我们可以窥见其在秘鲁的教学活动，似乎更适合用政府人员的“隐性外交战线”来形容，因为它的目标不是改善当地教育环境，而是打击共产主义的蔓延，只不过这项任务交由未经训练的年轻人开展。而和平队的志愿者在这一过程中似乎并没有自主权，也并不清楚自己进行教育援助的目的，反倒被迫成为美国国会在秘鲁潜在的“政治代理人”。当秘鲁以反美为主的民族主义爆发时，他们甚至会被冠以“间谍”等罪名，成为两国之间关系的牺牲品。但是当志愿者们所提供的教育援助真正符合秘鲁当局的需要时，这种政治角色又会被弱化，转而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当地的教育资源，这其中也不乏有志愿者主动寻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虽然在当时少之又少，但为和平队真正志愿意义上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三、牺牲与发展共存：秘鲁和平队的角色评析

若仅从和平队从事的工作来看，该机构足以称得上是国际间最大的义工组织，并给受援国的基层带来了一些积极变化。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和平队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一角色具有很强的传递性，它作为一个中间机构，是美国势力渗透与秘鲁“反美情绪”间接表达的有效工具。

其一，不管美国政治家承认与否，和平队都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它不会像美国国务院那样公开为美国对外政策进行辩护，不会同国际开发署般利用手中的资金和其他经济资源服务于美国对外政策，也不会像美国之音等传媒那样公开宣传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念，更不会像美国军队那样为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随时出手。但它的终极目标依旧是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国家利益。它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支隐性力量，通过公开的、从表面看似是“利他性”的活动中，加强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这就是后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 (Joseph Nye) 所称的，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软实力”^① (Soft Power)。因此，秘鲁对和平队本身就有着天然的怀疑态度，而和平队工作人员也非常明显地体现着该组织反对共产主义，重塑美国形象，拉拢秘鲁的意图，即便志愿者本身没有这种意识，但久而久之也受到了一些潜在影响，难免起到意识形态渗透、隐性干预秘鲁内政的作用。

其二，对于秘鲁而言，和平队也是其与美国发展外交关系的重要工具。当它需要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时，会通过邀请和平队向美国示好，力图开展合作，依托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裕的国家获取更多利益。而当秘鲁需要向美国表达某种不满情绪，同时又保证两国外交关系的根基不被动摇时，作为美国政府中地位相对不太重要的和平队，往往会成为其发泄不满的对象。基于此，秘鲁既可以通过驱逐和平队的方式来警告美国，又不至于因此中断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再者，这一时期派遣至秘鲁的和平队志愿者似乎并未做好在当地偏远农村或者拥挤城镇进行教育工作的准备，也为秘鲁打击和平队提供了契机。一位评价者朱利安·菲利普斯 (Julian Phillips) 曾写道：“秘鲁对许多志愿者的打击就像德克萨斯州对东方礼仪的影响一样。”^{[24](P10-12)}他审慎地指出了和平队的许多志愿人员所面临的文化冲击。同时，这些志愿者对拉丁人也充满厌恶，他们很难适应当地的文化，并且对秘鲁文化的诋毁是一种公认的行为模式。许多志愿者都因这种文化冲突产生了身心不适，而后被遣返回国。曾有评估者将秘鲁称为“巡回志愿者之地” (The land of the peripatetic volunteer)，而秘鲁人也经常把和平队称为“流浪团” (Cuerpo de Vagos)，或者更慈善地称为“旅行团” (Cuerpo de Paseo)。^{[25](P8)}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逐渐浮现，和平队的许多教学项目都被视为以美国模式重建拉丁美洲教育系统的行为，参与教育工作的志愿者也被认为是直接罪人。

管见所及，和平队在秘鲁的角色具有一定的悲情色彩，这一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府志愿者组织更像是两国博弈与妥协的牺牲品，极具被动型与脆弱性，秘鲁认为其最大的错误是与美国国会保持了密切联系，而美国政府又否认其是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实际上，许多志愿者本身无意宣传美国的冷战思维，特别是越南战争期间，诸多志愿者都抗议美国发起战争。但在大国外交战略中，志愿者自身的声音太过渺小，加之和平队组织机构不够完善以及一些志愿者的极端思想遭到秘鲁的反感与怀疑，使得和平队在秘鲁的发展极为曲折。换言之，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秘鲁，和平队就像一个政治足球，在两国间的政治游戏中被踢来踢去。但作为美国冷战时代文化外交的产物，和平队又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并未随冷战的终结而解散，而是延续至今，在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与开展国际志愿服务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结语

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时期，和平队开展的教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隐性渗透美国意识形态的意图。但它作为美国援助政策的一环，也向秘鲁提供了中等水平的人力援助，秘鲁也借助和平队传达其发展需求，增进了美秘两国的相互了解。但由于其本质隶属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所以从开始就遭遇秘鲁民族主义的抵制。加之和平队对其项目的管理极其糟糕，志愿者与秘鲁民众之间缺乏真正的了解，导致双方的文化冲突无法调和，和平队在秘鲁的教育活动最终走向黯淡。透过这一时期和平队在秘鲁的发展历程及其与美秘两国外交政策互动的分析，和平队这一中间角色的被动性、脆弱性也逐渐彰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波云诡谲外交关系中的牺牲品。

但就和平队的整体发展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赢得了受援国的欢迎，并让当地民众相对接受了部分美国的文化及价值观念。作为文化外交的附属品，和平队也让美国对外部世界有了更为客观和深入的了解，并为美国涉外部门培养了大量的“外国通”，这对美国外交决策同样大有

^① 软实力：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力而非高压政治来达到目的的能力，当其他国家想得到与本国同样想取得的结果时，本国就不必付出与高压政治同样大的代价来达到其目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影响力。可参见 Joseph S. Nye. The Power We Must Not Squander[N]. New York Times, 2000-3-11; Joseph S. Nye.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J]. Foreign Affairs, 1999, 78(3):25.

裨益。它虽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却并未随冷战的终结而销声匿迹，而是一直持续至今，活动范围也扩展至许多前苏联及中东欧地区，不仅服务美国国家利益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脱了服务于国家利益的角色，发展为真正具有一定志愿意义的、规模最为庞大的现代国际义工组织。

参考文献:

- [1] Sargent Shriver, "The Best Job in Washington," 1961, Box86, John F. Kennedy Library (hereafter cited as JFKL).
- [2] "On Colombia," November 18, 1961, Box2, Papers of the Peace Corps (hereafter cited as PC Papers), JFKL.
- [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Volume 12, Part 1," United States, 1961.
- [4] [10][11][14][19][21][23] Glenn Francis Sheffield. Peru and the Peace Corps, 1962-1968[D]. Th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1991.
- [5] "Director's Staff Record" (hereafter cited as DSR), 19 July 1962, Box 1, PC Papers, JFKL.
- [6] "DSR," 20 July 1962, Box 2, PC Papers, JFKL.
- [7]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M].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78.
- [8] Hoopes, Roy. The Complete Peace Corps Guide[M]. The Dial Press, INC., 1968.
- [9] Kevin Lowther and C. Payne Lucas. Keeping Kennedy's Promise: The Peace Corps, Unmet Hope of the New Frontier[M]. Taylor and Francis, 2019.
- [12] "On senior staff meeting with McGhee, Minutes of Meeting," 15 May 1962, Box 1, PC Papers, JFKL.
- [13] "Minutes of Small Staff Conference," 20 February 1963, Box 2, PC Papers, JFKL.
- [15] "Peace Corps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Minutes of Third General Meeting," 18 March 1963, PC Papers, JFKL.
- [16] Wegner, Herbert, "Peru Overseas Evaluation," 1963, Peace Corps Library (hereafter cited as PCL).
- [17] "Measurement of Peace Corps Program Impact in the Peruvian Andes: Progress Report 2," March 1 to May 31, 1963, Cornell University.
- [18][20] John Cobb and Robert Krug, "Peru Overseas Evaluation," 1965, PCL.
- [22] [24] Julien Phillips, "Peru Overseas Evaluation," 1967, PCL.
- [25] John Cobb and Robert Krug, "Overseas Evaluation, Peru," 1965.

Study on the Role of the U.S. Peace Corps i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Per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plomacy (1961-1968)

An Zihan

China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Abstract: The Peace Corp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since 1960s. During the Kennedy and Johnson administrations, the Peace Corps gradually entered its golden age of development. As a significant nation in Latin America, Peru boasts one of the largest contingents of the Peace Corps worldwide. However,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Cold War mentality and Peruvian nationalist movements, Peace Corps Volunteers' journey of educational service in Peru has been very tortuous, and has even become a victim of the diplomatic gam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the Peace Corp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Peru under the Cold War context are an important microcos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 foreign policy and Peruvian state needs. They reveal a certain sacrificial element behind them, yet they transcend the interests of both sides and break new ground in volunteering significance.

Keywords: Cultural diplomacy; United States; Peru; The Peace Corps; Role study